

左撇子的基因里暗藏着血腥与杀意？

Gataca

左撇子的杀意



Franck Thilliez

[法] 弗兰克·蒂利耶 著
谢莎娜 译

Gataca

左撇子的杀意



Franck Thilliez [法] 弗兰克·蒂利耶 著
谢莎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左撇子的杀意 / (法) 蒂利耶著; 谢莎娜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2
书名原文: Gataca
ISBN 978-7-220-09384-5

I. ①左… II. ①蒂…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020 号

Gataca by Franck Thilliez
Published originally under the title "Gataca" ©2011
Editions Fleuve Noir, Département d'Univers Poc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Beijing)Co., Lt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5-02 号

左撇子的杀意
ZUO PAI ZI DE SHAYI

[法国] 弗兰克·蒂利耶 著 谢莎娜 译

策 划
责任编辑
策划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谢 寒 韩 波
王怡翾
天行健
蓝 海
李 剑 孔 凌 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8mm × 210mm
12.25
345 千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384-5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致埃斯泰邦与特里斯坦

他们与世上另外的那七十亿微不足道的小蚂蚁一起

勤勉地参与了伟大的进化工程

三十多亿年来，地球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生命有机体，但对于生命存在的道理，它们始终一无所知。后来，其中的一个有机体，终于弄懂了事实真相。

——理查德·道金斯

科学研究不仅着力于关注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在于探索人力所能到达的极点，哪怕已超越了命运和伦理的界限。

——《玫瑰的名字》，翁贝托·埃可

致读者

人们常问我创作灵感从何而来，是源自一桩小概率事件，还是源自对某处风景的感触？是街头的一角，抑或是杂志角落里某个不起眼的故事？老实说我也不大清楚，这其中既没有秘密也没有诀窍。我倾向于灵光乍现或是凑巧遇见这类说法，就像被暴风雨中迎面飞来的残枝陡然砸到，吓了一跳。

于是这两年多来，我不断在寻找灵感，并为《暴力二部曲》的第二部寻找素材。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关于进化论的科学研讨会。一个教授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查尔斯·达尔文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朵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俗称马达加斯加之星。这种花的长度有二十五到三十厘米，而花蜜则藏在它的底部。在达尔文当时已知的所有鳞翅目昆虫中，没有哪一种能有这么长的喙来采集底部的花蜜。那么这种花又是如何传粉繁殖，从而不致灭绝呢？达尔文断言，在马达加斯加肯定有一种尚未发现的巨型鳞翅目昆虫，它具有足够细长的喙，能够得着花冠底部的花蜜。

整整四十一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这种巨蛾，它们的喙有二十五到三十厘米长……于是，为了纪念达尔文，人们将这种巨蛾命名为长喙天蛾。

我觉得这故事十分出人意料，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素材。于是我开始钻研生物学、进化论、遗传物质，并着手描绘您将要读到的这个故事。剩下的就是锤炼文字了。

这本小说再次把露西·安娜贝勒和弗兰克·夏戈带给了读者，在《影像感染》一书的末章，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完结，最后的段落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心理和感情都明显延续了上一部的经历，但我必须要指出，本书是完全独立的，没有读过上一部作品的读者们大可放心。

最后，祝大家阅读愉快。

序言

二〇〇九年八月。

这一天，阳光不该这么明媚灿烂。

这地球上所有的角落、所有的人都不该欢笑，不该在沙滩上蹦蹦跳跳，不该交换礼物。应该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来阻止他们的这种兴高采烈。是的，他们不该感到幸福，甚至不该感到无忧无虑。因为在某个地方，在那惨白的日光灯照射的走廊尽头，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有个小女孩感到很冷，很冷……

那是一种永远不会再离开她的冰冷。

根据警方通告，一具年龄大概在七至十岁，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女童尸体在尼奥尔和普瓦捷之间的省际公路上被发现。这消息刚传到里尔刑警大队，露西·安娜贝勒就跳上汽车，狠踩油门一路狂飙。五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肾上腺素不断燃烧，疲惫、焦虑，还有一秒一秒不断加剧的恐慌。她心里只是不断地回响着一句话：千万不要是我的哪个女儿，求您了，千万不要！她是个从不祷告的人，甚至已经淡忘了教堂里祈祷圣烛的气味，然而此刻却苦苦哀求着上帝。她甚至绝望地幻想着那是其他失踪的女童，也许是警察档案中还没来得及登记在案的，有可能是昨天才被绑架的，或是今天早上刚失踪的。

请别让我受这份罪，千万别是我的女儿。

千万，别是我的女儿！

她努力地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定不是自己的孩子。虽然克拉拉和朱丽叶走失的萨布勒多隆距离徒步旅行者们发现尸体的普瓦捷不远，虽然从女儿们失踪到她此时踏上普瓦捷法医所的停车场，只有短短的五天；但这些都一定只是巧合而已。

一定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么，露西为什么会孤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什么一股呛人的酸味在她喉间涌动，直让她恶心？

虽然已近黄昏，停车场的沥青地面依然热得发烫。在寥寥可数的几辆警车和私家车之间，弥漫着沥青和橡胶轮胎熔化后的气味。二〇〇九年的盛夏，在她看来，无论怎样都像是地狱。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她脑海里一直徘徊着一个词——面目全非。

“里面躺着的那个女孩，不会是我的女儿。”

露西再一次翻看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没有提示未读信息。她再一次打开留言信箱——说不定公路上信号不好，也许她早已收到了语音消息，告诉她克拉拉和朱丽叶已经被找到，一切安好，她们正在玩玩具，等着她回家。

一辆小货车砰地关上后门，响声把她拉回到了现实中。没有任何留言。露西把手机收好，走进那栋大楼。她对一成不变的法医大楼再熟悉不过了：接待处对着入口，一楼二楼是分析实验室，地下室是太平间和解剖室。死去的人就落得这个下场，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权利。

面容憔悴、眼睛充血的女警探向前台询问，声音听起来犹豫而不安。太多的哭泣和泪水、尖叫和呼喊，很多晚上彻夜不眠，让她的声音变得嘶哑而低沉。接待处回答说：“东西（又是一个让她胸口发闷的词）是在下午六点二十二分送到的，如无意外，法医应该差不多完成体表检查了。稍后他会从尸体的内脏肌肉入手，去了解死者生命结束前最后几分钟里发生的事。”

“一定不是我的孩子，不是克拉拉，也不是朱丽叶。”

露西快要站不住了，她的双腿颤抖着，像是在命令她转身离开。她手扶墙壁，沿着长廊慢慢地走着，脚步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然而墙外

的世界却是一片美好的夏日景象，人们唱歌跳舞。这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强烈对比——到处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唯独这里……

三十秒后，她来到一扇椭圆形玻璃窗前。这里充满死亡的气息，甚至没有掩盖这味道的人造香味。露西也曾领着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来到这个漆黑的隧道前完成认领程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还没看到尸体前便已崩溃在地。

玻璃窗的另一边有一张戴着口罩的脸，正用专注的眼神审视着一张露西视野内无法看到的不锈钢桌子。露西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同样的场景，那时她的眼里只看得到一个全新的物证线索，她充满期待，跃跃欲试，期盼着能碰上一件让人兴奋甚至超出常理的案件。她曾像这“可恶”的法医一样，把这一切仅仅看作一个案件，甚至在结束每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后，仍能平静地打开电视小酌一杯。

然而今天，一切都变了。她既是警察也是受害者，身为一位母亲，面对着一具幼童尸体。

“不是我的女儿，是个无名女童，请别让我来受这份罪。”

这句话给了她最后一丝力量。她双手按在门板上，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一个五十岁出头的男人把车停在了法医大楼停车场最僻静的地方，恰好隐藏在一辆运送医疗用品的小货车后面。这是一个便于观察大楼所有出入口而又不会被轻易发现的理想位置。他前额挂满汗珠，脸上的胡茬子看上去好几天没刮了，一副太阳镜遮住了双眼，看起来像个正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歹徒。这热度，这该死的热度，闷得让人喘不过气……他往上推了推眼镜，拿手帕擦了擦眼皮，密切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在犹豫着，是进楼里去询问死亡女童的情况，还是等负责尸检的司法警官出来，再上前打探消息呢？

窝在驾驶座里，弗兰克·夏戈来回揉着太阳穴。多久没睡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躺在床上时总会辗转不安。每到夜里，他就像一个罪人一样深深地责问自己。汽车收音机传出似有若无的音乐，敞开的车窗外吹

进微弱的气流，这一切让他的眼皮越来越重。迷糊中，脑袋无意识地向旁边一歪，然后条件反射似的惊醒了。身体需要睡眠，可理智却命令他清醒。

身为中央暴力防治局局长的他，把被太阳烤热的矿泉水倒入掌心，在脸上胡乱捋了一气，然后迈出车外，活动着麻木的双腿。微风把他那早已湿透的衣服吹得粘在身上。此时，他感到自己无比愚蠢。他应该光明正大地走进去，向前台出示自己那张带有红白蓝三色法国国旗的证件，然后要求旁观尸检。想要得到消息的话，这是最机械化、最标准的职业程序。在过去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里，他至少有二十年是在刑事调查部门度过的。他见过多少具尸体在法医冰冷的器械下像火腿一般被切开，两百个？还是六百个？

但这次，受害人是个孩子。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无法接受这一切。在解剖刀折射的冰冷光线下，稚嫩光滑的小小胸膛显得那么苍白。当安娜贝勒的两个小女儿在沙滩上玩耍的时候，他看见过她们那灵动的眼神，他跟她们一起玩皮球，一起在海浪间追逐，而她们的母亲则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打心眼里爱她们。然而，老天，这两个有着美丽蓝眼睛的孪生姐妹竟然因为他而失踪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几天前。

这是他失去自己的家庭以来，觉得最漫长、最煎熬的一个星期。

尸体解剖、生化检测、毒理学测试会带来怎样的结论？实验室的打印机会在洁白的纸张上描绘出怎样可怕的炼狱图景？他对死亡过程的毫无逻辑性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即使在断气后，一个死人在警察和法医手里依然无法安息。案件如果不能水落石出，对一具永远无法重见阳光的身体来说，就是最大的侮辱。而那些歹徒竟然对孩子下手……夏戈狠狠地握紧了拳头。

远处传来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应该是某辆汽车正在停进车位。夏戈隐身在小货车后面，看了看那蒸腾着热气的停车场，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都像干燥的木头一样嘎吱作响。最后，他还是钻进了自己那辆破烂得就快报废却还在苦苦支撑的老爷车。

就在此时，他看见了她。一瞬间，他全身几乎碎裂成粉末。她穿着

牛仔裤，灰色的T恤衫耷拉在腰带外，头发凌乱地扎成一束马尾，那双原本明亮的蓝眼睛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神采。她看起来就像是块被丢弃的桌布，破旧而黯淡。这一瞥让他心如刀割。

看来露西·安娜贝勒也和他一样，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她一定密切留意着所有电子信息，紧盯着警察联网中所有关于儿童的事件，一通又一通电话不断地询问着。她也像他一样，第一时间风驰电掣赶到这里。老天，她来这个“地窖”要做什么？要见证她亲生女儿的解剖现场？哪怕是夏戈自己，当年也不忍亲眼看着女儿艾洛伊斯被法医开膛破肚，这比吞下一颗扯掉拉环的手榴弹还让人无法忍受。

然而，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哪里来的勇气？假如这不是她的孩子，露西是否要继续搜遍所有的太平间，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如果找到了其中一个，却永远找不到另一个呢？她会不会被折磨得发狂？

夏戈双手紧握方向盘，犹豫着自己是该跟着露西走进大楼，还是该在原地等待她再次出现。可是，万一露西出来时几近晕厥、濒临崩溃，他怎么能控制住自己不冲上前去把她抱紧？他怎么能做到不把她搂入怀中，在她耳边轻声安慰一句“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做不到！只有一个解脱的方法——逃！他太爱这个女人了，无法面对这一切。

终于，他扭动钥匙，发动汽车，逃向巴黎。

当法医所终于在倒车后视镜中消失得不见踪影时，夏戈明白，他再也无法面对这个女人了。

顷刻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憎恨和悲痛把他淹没了。

露西一路疾驰，全然忘却了自己头痛欲裂、泪似火烧，不去想那只曾在她腹中轻轻挠动的稚嫩小手，只想离那个充满死亡烙印的地方越远越好。她不吃不喝，只一味地干呕，唯一支撑她的只有燃烧着的肾上腺素。她的车速已经远远超过了高速公路的上限，甚至能听到车身经过路灯时产生的呼啸声。要是能一头撞上栏杆，那倒好了。此刻她只想在沥青公路上一路狂奔，直到自己不再去想。可是那画面却不依不饶地萦绕

在她脑海里：躺在巨大解剖台上，那具小小的尸体早已蜷缩成一团，锋利的解剖刀发出刺耳的狞笑声。

无法辨认，她竟然该死地无法辨认那是不是她的女儿。她们是她生命的所有动力，陪伴了她整整八年，日日夜夜。女儿生病时她再晚回家也要在床前陪伴，学校的嘉年华她也从不错过。她们脸上的每一个棱角她都熟记在心，她们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小动作，乃至别人无法察觉的细微差别，她都清清楚楚。

这是她血中的血，肉中的肉啊！

还需等待，每一秒都像毒药在她血管中流淌。等待她的只有噩耗：她的女儿要么已经死去，要么还在刽子手的魔爪里瑟瑟发抖。糟糕，抑或是更糟糕。

是什么魔鬼把她们掳走了？为了什么？克拉拉和朱丽叶当时在萨布勒多隆的海滩上，她们只是要去吃个冰激凌，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竟然人间蒸发了。歹徒是毫无目标地临时起意绑架，还是早就盯上了她们？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露西无法抑制地设想着各种可能性、各种糟糕的情节，它们不断转换，一个比一个更糟糕，直到每一个设想都演变成绝境。惶恐就像一团乱麻，无穷无尽。

她把愤恨都发泄到夏戈身上，哪怕是他死了也不能原谅。她不想再见到他，他要是敢再出现，她一定会跳上去割断他的喉咙，让他死个痛快。

接下来的几天她要怎么办？漫长的等待，问讯，追寻凶手。什么样的禽兽会对一个孩子下这种毒手？不管他在哪里，露西一定不会放过他，哪怕拼尽最后的力气。

“不是克拉拉，也不是朱丽叶。那不会是克拉拉或朱丽叶。今晚我看到的，是别的……”

在里尔市的大学城区域，微弱的灯光从她公寓的窗户透出来。这是个热闹的地段，平凡但洋溢着生机，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然而此时，所有的街道都一片寂静，只有交通灯的红黄绿三色循环转换，单一而沉闷。露西不敢回家。那四面墙，没有了克拉拉和朱丽叶，比棺材还让她恐惧。

露西的母亲玛丽·安娜贝勒不断吞下咖啡和药丸，好让自己保持清醒。

现在已是凌晨三点。这个两鬓已有几缕褪色金发的老太太已不复往日般精神矍铄，看起来像是在几天内老了十多岁。是她，在两个小外孙女还在襁褓中时，承担了所有的抚育工作。露西的工作特殊，经常二十四小时待命，是玛丽为两个小女孩换洗尿片，温热奶瓶，在她们生病时守候在她们的摇篮前，或是陪伴她们直到午夜，等待疲惫不堪的露西回家。

而现在，上帝啊……

露西待在玄关处一动不动，紧咬牙关，面朝着母亲。她只想逃得远远的，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她在想着明天，想着自己睡在那有两张空床的粉红和绿色相间的房间里，睡在那一大堆期待小主人给予它们拥抱的玩偶间——那只大笨象是朱丽叶在马戏团游园会上玩夹娃娃机赢来的，克拉拉最爱把那只河马紧紧抱在胸前。所有的这些回忆，如今变成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看到露西愣着不动，母亲只好迎上前去，抱紧她，却沉默不语。这时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说“孩子们都会平安无事地回家”或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是警察；而自己，是警察的母亲。她们都心知肚明，儿童失踪四十八小时后，能活着被找到的概率近乎为零。无数案例和数据都证实如此。

玛丽注意到女儿发白的手中紧拽着的透明防水袋，心里一下就都明白了。那里面装着一个口罩、一个透明试管、一副一次性手套、一张硬纸片和三支棉签，都是用于采集DNA样本的。

露西抱着母亲，喃喃地问道：“我该怎么办，妈妈？我该怎么活下去？”

玛丽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她是位身材高挑的女性，将近六十岁，身段仍保持得很好，显得风韵犹存。但是今晚，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着救命。可她强忍着，强忍着……

“我会在你身边，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露西一边抽泣着，一边低声说：“那个孩子，那个躺在解剖台上的孩子，我……该死的……我竟然没办法确定。她不是我的孩子，我知道的。我的女儿不会落得那个下场。怎么会有人下得了这样的手？不可能……”

“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这个畜生……他当时一定就在现场，纵火之后，他就现场看着火烧起来。”

“露西……”

“也许他们很快就会抓到他，也许他手里还有别的女孩，其中会有我的两个孩子……”

玛丽的回答让露西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也许，露西，这都是也许。”

女警官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在昏暗中，她去洗了个手，然后艰难地撕开鉴证科实验室的专用袋，一举一动都艰难无比。她戴上手套，回到客厅，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向后退缩着，双手颤抖着捂上嘴巴。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官，露西把采样签准确地塞入口中，在舌根末端的白色舌苔上来回划动，以充分沾上唾液。她耸起肩膀擦了一下脸——绝不能让样本受到任何污染，哪怕是慈母悲伤的泪水。她知道这么做会让人瞠目结舌，甚至让人感到不真实——她要取自己的DNA样本与死亡女童进行对比。她必须要得到确切的答案——也许，她的一个女儿已经不在人世。

露西把采样签上的唾液抹在一张粉红色卡片上的标示位置处——FTA基因卡——直到确定自己的DNA已经放置在上面。她把卡片放在密封袋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拉上密封口。密封口处有一排红色的警示字样，“警方专用，请勿开启”。

明天一大早，样本就会被送到一个独立实验室，与其他的数百个样本放在一起。它的未来、它们的未来，全指望着一个不起眼的，乃至肉眼无法看到的链条。这个链条由无数的重复字母——A（腺嘌呤）、T（胸腺嘧啶）、G（鸟嘌呤）、C（胞嘧啶）——排列而成。它们组成独一无二的基因密码，除非是同卵孪生儿才有可能相同。警察们曾靠着基因密码追踪过无数的罪犯。

不管她有什么信仰或希望，露西仍不由自主地想，也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必须很快地面对这一现实：她生命中两颗璀璨的星星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她要怎样才能面对？

一年后。

马尼安领导的巴黎犯罪调查小组在最短时间内来到了犯罪现场。血案发生于文森森林动物园附近，距离多美思尼湖不远，与大名鼎鼎的奥尔菲弗河岸36号巴黎法院警察局相隔也不过数公里。天青水蓝，只是在这九月初的日子里，天气还略显清凉。

在森林里慢跑的路人发现了这具早已没气的尸体，他即刻拨打了112。不到一小时，案件就从救援警察手中通报到刑侦队前台，三楼A梯道的司法警察最后才得到消息，屁股终于离开了他们那热乎乎的沙发。

死者约四十岁，在绿色大众波罗的驾驶座上，保持着坐姿。初步判断，死因应是胸腹腔受到锐器连续刺伤，速度之快让他连安全带都来不及解下。他下巴耷拉在胸前——慢跑者正是被这奇怪的姿势吸引了目光，才发现他早已死亡。轿车驾驶座一侧的车窗已经被摇下，里面一览无余。

弗兰克·夏戈是这个四人小组里的二把手。此时他正带头走在最前面，步履坚定迅速，一下子就进入了犯罪现场。他的同事们跟在他身后，少说落下十米。夏戈越过救援警察拉起的警戒线，走向那台被环绕的树木遮掩得相当隐秘的轿车。

奥尔菲弗河岸的同事们对文森森林并不陌生。这里的林间大道和隐秘处长年驻守着大批的妓女、变性人、异装癖。不过，出事的这个地段一侧是动物园，另一侧是湖泊，向来人烟稀少，相对平静。也正因如此，这是个不易被察觉的绝佳作案地点。

夏戈穿着不合身的牛仔裤，宽大的裤腿几乎飘荡起来。他身上套着一件黑T恤，脚上随意地蹬了一双便装船鞋。他戴上一次性手套，手臂从驾驶座窗伸进车里，将死者的下巴抬起转向自己。五十来岁的组长马尼安一下子蹦起来疯了似的冲上前去，拽着夏戈T恤衫的后背吼道：“你在搞什么鬼？”

夏戈轻轻地把死者的脸朝汽车里推了一下，仔细观察着死者那满是血迹的衣服、毫无生气的眼睛和苍白的面孔。“我好像认识这人……你不觉得他很脸熟？”

马尼安把夏戈像罪犯一样往外揪，咆哮道：“遵守程序！你在搞什么？给我添乱呢？”

“弗雷德里克·于罗，我们十多年前追捕过他。当年他的案子是我经手的，那会儿你还是我的手下呢，记得吗？”

“现在我关心的是你在干吗？”

夏戈瞅着这个级别比自己低的上司。自从他被重新分配职务以来，局长已变成了他的外号，或是某个同事向他问好时的戏称——“你好吗，局长？”他的职责也跟一般的警探没有区别。离开南塔尔犯罪行为分析部那干净得过分的办公室，回归街头，扫荡贫民窟和抓捕低级罪犯之类的工作——这是他付出的代价。只不过这次降级是夏戈主动要求的，哪怕被安排去跟马尼安这样的人做同事也在所不惜。他的调职申请把以前的上司们都吓了一跳——降职申请，这在整个法国都前所未闻。于是他们提出让他领导一个犯罪调查小组，这样好歹能说得过去。可他拒绝了，他宁愿从头开始，回归底层，手握配枪，直面黑暗。

“你还记得他当时犯了什么事吗？”夏戈嗓音发干，“他杀了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他的亲生女儿。”

马尼安掏出一根香烟点上，夹在早已被烟熏黄了的手指间。他是个